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八 編 第 5 冊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

魏 榮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5 冊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

魏 榮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魏榮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15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編；第5冊）

ISBN：978-986-322-381-8（精裝）

1. 漢代文學 2. 文學評論

820.8

102014639

ISBN-978-986-322-381-8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 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322-381-8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

作 者 魏 榮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八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

魏 榮 著

作者簡介

魏榮，1980年生於北京，2009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曾發表《〈搜神記〉中的韻文研究》，《論六朝志怪小說婚戀故事的分離原則》等論文。現任教於北京四中。

提 要

西漢後期至兩漢之際，經學的發展，使得國家制度建設在「尊經崇禮」思想的影響下，以復古為主。從漢元帝啟用儒生稽古改制，到王莽全面復興周禮，儒學復古思潮愈演愈烈，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呈現出復古與革新兩端。本文立足於此期各項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變遷，結合此期的制度思想與文學觀念，探討儒學獨尊、經學主導和禮制復古背景下制度與文學的關係。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節 西漢後期文學研究綜述	1
一、古人對西漢後期文學的研究	1
二、今人對西漢後期文學的研究	4
第二節 西漢禮制思想演進述略	8
第三節 選題意義與研究思路	13
第一章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觀念	17
第一節 西漢後期儒學獨尊與制度沿革	17
一、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	18
二、西漢後期的制度沿革	20
第二節 宗正制度與劉向的禮教觀念	26
一、宗正制度與劉向禮教觀念的形成	26
二、劉向的禮教觀念與文藝思想	30
第三節 獻賦制度與揚雄的文學觀念	36
一、獻賦制度與揚雄早期的辭賦觀念	37
二、從進獻到退守：揚雄文學觀念的轉換	42
第四節 校書制度與劉歆的文學觀念	45
一、校書制度與劉歆的文化建構	46
二、《七略》與劉歆的文學觀念	49

第二章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	55
第一節 國家祭祀制度與西漢後期的朝議	56
一、國家祭祀制度在西漢後期的發展	56
二、宗廟祭祀制度與西漢後期的廟議	58
三、郊祀制度與西漢後期的郊議	63
第二節 博士制度與西漢後期文士依經論政	67
一、博士制度在西漢後期的發展	67
二、博士制度與西漢後期文士的經學修養	70
三、西漢後期依經論政風氣的形成	72
第三節 察舉制度與西漢後期的君臣問對	76
一、察舉制度在西漢後期的發展	77
二、察舉制度與西漢後期的策問	80
三、察舉制度與西漢後期的災異論	84
第四節 郎官制度與西漢後期政論文	88
一、郎官制度在西漢後期的發展	89
二、郎官制度與西漢後期的陳政事疏	92
三、郎官制度與西漢後期的官員評議	96
第三章 兩漢之際制度思想與文學觀念	101
第一節 歷代文人學者眼中的王莽改制	102
第二節 王莽改制及其禮制復古思想	107
第三節 禮制思想與揚雄後期文學觀念	111
第四章 兩漢之際的制度與文學	117
第一節 禪讓制度與兩漢之際的奏疏	118
一、禪讓制度與兩漢之際的符命論	118
二、禪讓制度與兩漢之際文臣頌德	122
第二節 州制、官制與揚雄的箴文	125
一、兩漢之際的州制與揚雄的《州箴》	126
二、兩漢之際的官制與揚雄的《官箴》	128
第三節 喪葬制度與揚雄的誄文	132
一、《元后誄》創作的制度文化背景	133
二、《元后誄》及其文體定型意義	136
結語	139
參考文獻	149
後記	157

緒 論

第一節 西漢後期文學研究綜述

一、古人對西漢後期文學的研究

最早對西漢後期文學進行反思的是揚雄，晚年的他結合自身創作實踐，認為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註1〕，對辭賦文體持否定的態度：「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註2〕同時，他也提出了他的鮮明的辭賦觀，即「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門之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註3〕揚雄既承認詩賦之「麗」的美學特點，也不諱言其功利用途。自此，對於兩漢之際文學思想的研究大多圍繞揚雄展開。

桓譚《新論·道賦》有言：「揚子雲工於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屬於創作論範疇。東漢王充在《論衡》中也對揚雄之賦有所提及：

〔註1〕〔漢〕揚雄《法言》卷二《吾子》，汪榮寶《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9～50頁。

〔註2〕〔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575頁。

〔註3〕〔漢〕揚雄《法言》卷二《吾子》，《法言義疏》第49～50頁。

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仙仙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賦》，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爲，神鬼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常卿之賦言仙無實效，子雲之賦言奢有害，孝武豈有仙仙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之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註4〕

這裏批評了馬揚之賦不僅沒有起到諷諫作用，反而助長了帝王的成仙之意和奢侈之心。又如：

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云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辨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註5〕

強調文學內容要有「是非之分」和「崇實之化」，要對社會風氣有教益。因而王充更爲推崇辨明是非和崇尚實質的桓譚，所以他指出「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註6〕

其後，影響最大的，對於西漢後期文學進行過理論歸納的便是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其《辨騷》、《詮賦》、《雜文》、《神思》、《知音》、《體性》、《通變》、《章句》、《麗辭》、《比興》、《誇飾》、《事類》、《鍊字》、《才略》、《誄碑》、《書記》等篇都涉及西漢後期和兩漢之際的文士及其辭賦創作特點。其中對於揚雄關注最多，其評價中出現的幾個關鍵詞分別是「沉寂」、「銳思」、「意深」、「覃思」、「極思」，指出了揚雄的構思特點，此外還有「志隱而味深」，〔註7〕「觀其涯度深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註8〕「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採」〔註9〕對於揚雄各體作品都有高度評價。難怪徐復觀先生有言：「我認爲最能瞭解揚雄文學的，古今無如彥和。」〔註10〕此外，《文心雕龍》中也有論及桓譚、劉歆的，如《神思》篇：「桓譚

〔註4〕〔漢〕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6頁。

〔註5〕〔漢〕王充《論衡》卷二十七《定賢》，第420～421頁。

〔註6〕〔漢〕王充《論衡》卷二十九《案書》，第440頁。

〔註7〕《文心雕龍·體性》，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506頁。

〔註8〕《文心雕龍·才略》，《文心雕龍注》卷十，第699頁。

〔註9〕《文心雕龍·書記》，《文心雕龍注》卷五，第456頁。

〔註10〕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89頁。

疾感於苦思」說的是君山構思之苦；《章句》篇：「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說的是劉、桓二人爲文一韻到底；《事類》篇：「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說的是《遂初賦》對於史傳所記史事的徵引，等等。之後歷代賦論對於揚雄都有所論及，大多將其作爲辭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中也有對揚雄單篇作品的研究，比如明代謝榛曰：「揚子雲《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予何爲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於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於窮鬼多矣」〔註11〕將揚雄的戲謔之作如此解讀，並且上升到對其人品的攻訐，實爲不當。明代胡應麟《詩藪》則對揚雄《反離騷》的創作意圖有所辨析：

揚子雲《反離騷》，蓋深悼三閭之淪沒，非愛原極切，不至有斯文。長沙、龍門先已並有此意。班孟堅獨載此於《雄傳》，其義可知，第子雲命名太過，又莽世不能遠引，故爲後人所持藉。如賈生賦《弔屈原》，子雲但以此命名，亦何不可。本其情出於慕說傷痛，豈薰蕕歧趣者。……揚子雲《反離騷》，似反原而實愛原。與女嬃之罵同。

〔註12〕

可謂深得子雲作意。清人程廷祚在《騷賦論》中對揚雄之賦也給予了很高評價：「子雲之《長楊》《羽獵》，家法乎《上林》，而有迅發之氣；《甘泉》深偉，廟堂之鴻章也。大抵漢人之賦，首長卿而翼子雲，至是而賦家之能事畢矣。後有作者，弗可尙已。」〔註13〕

西漢後期至兩漢之際，揚雄和劉向無疑是最爲重要的兩個思想家，後人難免將二者對比論之。如《晉書·范喬傳》載：「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註14〕李、范二人各以才學和文章爲標準，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清人全祖望亦著文論劉揚優劣，他從學術和品節兩方面力

〔註11〕〔明〕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127頁。

〔註12〕〔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一《遺逸上·篇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0頁。

〔註13〕〔清〕程廷祚著，宋效永校點《青溪集》卷三，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第67頁。

〔註14〕〔唐〕房玄齡《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32頁。

證劉向優於揚雄，「向之所學甚正，所操甚偉，西京儒者，自董仲舒之外，莫之逮也……雄以艱深文其淺陋，且自比於周公、孔子，而實則摹擬相如而未能，可謂妄矣。」〔註15〕其說影響之大，成為清儒論說的重要課題。〔註16〕

清人論西漢後期文章，以劉熙載之論最為簡賅且具代表性：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註17〕

近代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稱：「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興，文辭之繁，賦之末流爾也。」〔註18〕結合漢代社會背景對於漢代後期的賦作內容和賦風予以概括。

綜上，古人對於西漢後期文學的研究，以文學觀念和作品風格為主，輔之以作家思想研究，研究對象相對集中，研究方法較為接近。雖如此，其立足於文學審美風格的作品研究，對於我們認識此期文學大有裨益。

二、今人對西漢後期文學的研究

今人對兩漢文學和文學思想的研究集中在各個版本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和文學思想史中。魯迅先生的《漢文學史綱要》在漢代文學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十篇文章中有五篇涉及漢代文學，簡賅而犀利，惜止於西漢中期而不及其後。〔註19〕今人有聶石樵先生的《先秦兩漢文學史》結合翔實的史料，在銓評史事的基礎上，呈現出體系清晰的文學史實，對於我們認識此期文學很有啟發。〔註20〕此外，趙明《兩漢大文學史》〔註21〕和史仲文《中國秦漢文學

〔註15〕〔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九，朱鑄禹《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3～554頁。

〔註16〕參看徐興無《劉向評傳》第九章相關論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70～282頁。

〔註17〕〔清〕劉熙載《藝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頁。

〔註18〕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75頁。

〔註19〕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註20〕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註21〕趙明《兩漢大文學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

史》〔註22〕是為數不多的漢代文學專史。具體到西漢後期的文學，今人編寫的各體文學史多少都有涉及，如郭預衡先生在《中國散文史》中將西漢後期、兩漢之際的論說雜文歸入「文風復古時期」，並立足於文章風格特徵，對劉歆、揚雄、桓譚、王充四位作家予以評述。〔註23〕馬積高《賦史》則分析了元、成至新莽時期賦的演變，指出這時期的賦作由武、宣時的尙染縱橫之餘風變為漸漬於詩教；在形式上的模擬之風則從騷賦擴展到了文賦。〔註24〕

文學思想研究方面，代表作為許結《兩漢文學思想史》。著者認為西漢後期文學最大的弊端即在於倣古取貌，導致創作性消退，文學思想的消極面亦因此而來。但肇自劉歆《七略》定型、班固《藝文志》之辭賦分類「仍然以不可輕估的文體觀，對經學氣息濃厚的西漢文學思想的扭轉與文章之文觀念的確立，有著巨大的歷史貢獻。」並進一步指出「就時代的現實意義而言，劉《略》的詩賦文體觀同樣是一種在西漢文化衰變期文學觀的理論覺醒意識，起了兩漢文學思想間的傳遞作用。」〔註25〕這個認識是很到位的。查屏球《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首章《遊士的失落與經師的文學》分析了漢武朝士風轉變對文人心態的影響，並著重從簡帛文本特點說明其時士人學風與文風的關係，闡釋與考論結合，有理有據。〔註26〕藍旭《東漢士風與文學》首章《兩漢之際》結合史料分析兩漢之際士大夫的政治心態及其思想淵源，簡明清晰。〔註27〕此外，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註28〕也有個別章節涉及兩漢之際的文學思想。另有南京大學教學崗博士論文《兩漢之際思想與文學》，分章論述了兩漢之際政治與社會思潮、兩漢之際命定觀、兩漢之際政治思想與經書注解的互動變化、西漢賦作從諷諫到頌揚的轉變。相對而言，第三章的研究頗有新意，以札記形式，將兩漢之際一些經書中具體條目注解的變遷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背後的文化原因。惜所論之例太少，格局有限。〔註29〕

〔註22〕史仲文《中國秦漢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註23〕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註24〕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註25〕許結《兩漢文學思想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

〔註26〕查屏球《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註27〕藍旭《東漢士風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註28〕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註29〕教學崗《兩漢之際思想與文學》，南京大學，2003年。

與古代研究者一樣，今人也將此期作家研究的目光集中在揚雄身上，如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之《揚雄論究》〔註30〕，日本學者岡村繁《周漢文學史考》第八章《揚雄的文學、儒學及其立場》，〔註31〕方銘《經典與傳統：先秦兩漢詩賦考論》末章《揚雄研究》，〔註32〕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下編三四章分別對司馬相如與揚雄思想之異同，以及揚雄與東漢思潮的關係予以深入探究。〔註33〕其中尤以徐著對於揚雄的論述最為全面、深透，涉及揚雄的生平、所處時代、人生形態、辭賦作品、《太玄》、《法言》、政治思想諸多方面。其中不乏精彩之處，例如對於揚雄之「揚」，到底應從手還是從木的考證；對揚雄的人生形態以「知識型」概括；對揚雄的思想創造活動以「智性」二字概括，等等，都是非常恰切的。另有博士論文《淑周楚之豐烈：揚雄作品的文化闡釋》〔註34〕和《揚雄美學思想研究》〔註35〕，以及碩士論文《揚雄辭賦及其賦論之研究》〔註36〕、《揚雄的文學思想：以「因」「革」為中心》〔註37〕、《揚雄文論研究》〔註38〕、《一個儒者的執著與徘徊：試論揚雄的自我認同及其矛盾》〔註39〕。除此之外，馮小祿《從摹擬論揚雄〈反騷〉的範式意義》〔註40〕一文指出政治道德化批評和模擬消極論遮蔽了對《反騷》文學史意義的準確認識。面對屈原的文學技巧與典型的人格模式，揚雄靜觀默察時代精神之變遷，而有意識地以模擬的形式作《反騷》，來達成新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文學風貌的建立，從而在文學技巧和人格心靈上成為新的範式，為後代文人所仿倣。這就將《反離騷》的意義予以昇華，令人耳目一新。王春淑《揚雄著述考略》〔註41〕則對文獻所載揚雄著作予以類分併一一考論，

〔註30〕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註31〕 〔日〕岡村繁《周漢文學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註32〕 方銘《經典與傳統：先秦兩漢詩賦考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註33〕 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註34〕 侯文學《淑周之風烈：揚雄作品的文化闡釋》，東北師範大學，2003年。

〔註35〕 萬志全《揚雄美學思想研究》，山東師範大學，2006年。

〔註36〕 陳碧仙《揚雄辭賦及其賦論之研究》，福建師範大學，2002年。

〔註37〕 康衛國《揚雄的文學思想：以「因」「革」為中心》，陝西師範大學，2003年。

〔註38〕 王棟《揚雄文論研究》，湖南師範大學，2005年。

〔註39〕 林曉雁《一個儒者的執著與徘徊：試論揚雄的自我認同及其矛盾》，北京大學，2004年。

〔註40〕 馮小祿《從摹擬論揚雄〈反騷〉的範式意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129～134頁。

〔註41〕 王春淑《揚雄著述考略》，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7月，第119～123頁。

展現揚雄著述之概略，文獻爬梳十分細緻。此外，比較研究也是作家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關於揚雄的比較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方銘《揚雄與劉勰》，研究者基於二者在中國文學理論建設史上的獨特意義，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揚雄及其作品的評價出發，比較劉、揚二人對於楚辭問題、漢賦問題、創作問題和宗經徵聖問題的看法，從中展現二者思想的異同和各自的局限。〔註42〕另有孟繁治《劉向劉歆揚雄之比較》試圖通過三人之比較展現西漢後期各類士人的政治文化心理，是中國古代「劉揚優劣論」的延續。〔註43〕

文學與文化、學術的關係也是研究者較為關注的方面。如曹勝高《漢賦與漢代制度》研究漢賦與漢代都城制度、校獵制度、禮儀制度的關係，結合大量史料，印證漢賦中的敘述和描寫，並由此延伸探討漢代的相關制度，考論較為細緻。〔註44〕馮良方《漢賦與經學》對漢賦與經學的關係作了系統分析。從漢賦與漢代經學「同體共生」的關係入手，通過對漢賦和經學的發生、確立和解體的總體把握，勾勒出二者大致相同的發展軌迹，探討二者親和與悖離的現象及其本質。〔註45〕雖對兩漢之際賦與經學的關係少有論述，但是對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漢代學術與文學的關係還是不無啓發意義的。

此外，還有一類專著，以梳理文學史料為主，在搜集、整理文獻材料的基礎上，結合史料的對參和考證，力圖勾勒出文學發展的脈絡。如以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註46〕和易小平博士論文《西漢文學繫年》〔註47〕以及曹道衡、劉躍進《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註48〕，都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漢代文學的文獻參照。

論及漢代文化，經學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註49〕、《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註50〕、王葆玆《今古文經學新論》〔註

〔註42〕方銘《揚雄與劉勰》，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秋之卷（總第17期），第80～87頁。

〔註43〕孟繁治《劉向劉歆揚雄之比較》，許昌師專學報，1991年第3期，第28～33頁。

〔註44〕曹勝高《漢賦與漢代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註45〕馮良方《漢賦與經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註46〕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註47〕易小平《西漢文學繫年》，山東大學，2005年。

〔註48〕曹道衡、劉躍進《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中華書局，2005年。

〔註49〕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註50〕徐復觀《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註51〕王葆玆《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51)、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註52〕、程勇《漢代經學文論敘述》〔註53〕，都對我們瞭解漢代經學文化背景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借鑒。因未直接涉及文學研究，此不詳述。

綜上，對於西漢後期至兩漢之際的文學研究主題相對集中，以單個作家、作品的考辨和闡釋為主，而對於此期文學整體風貌尚未有人進行獨立的宏觀把握，本文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西漢後期的制度建設、禮制思想和經學發展，考察這一時期制度與文學的關係。在考辨制度的前提下，探討制度對於文學的影響；或從文學作品中，探尋制度演變的進程，在制度和文學的雙向互動中，尋求制度沿革與文學演進之間發生作用的規律。

第二節 西漢禮制思想演進述略

西漢後期至兩漢之際的制度建設是圍繞著禮制建設全面展開的。禮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由此可見，在中國社會，「禮」與倫理道德、風俗教化、法律制度、人倫關係、政治制度、軍事法令、宗教哲學等緊密結合，成為日常行為規範的基本準則，孟德斯鳩因而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註54〕由此，禮制和禮儀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西周之初，周公損益殷禮〔註55〕，為走向勃興的周王朝制禮作樂〔註56〕，「禮」成為西周文明的象徵和代表，禮制儼然成為立國之本。

《禮記·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制禮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註52〕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註53〕程勇《漢代經學文論敘述》，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

〔註5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北京，1978，第316頁。

〔註55〕《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注疏》卷二，〔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63頁。）

〔註56〕《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禮記正義》卷三十一，《十三經注疏》第1488頁。）

是走向文明的標誌；對於統治者個人來說，則是政治成功的象徵，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表現。漢代繼秦而起，前有秦亡的歷史教訓可資借鑒，又有統治者個人欲建立「大一統」王朝的政治抱負作為動力，於是，有漢一代，當權者無不熱衷於制禮作樂，以期建立一個思想空前統一、國勢空前強大、經濟空前富庶的帝國。這一切自然少不了儒士的推波助瀾。儒家思想從先秦子學發展成為佔據中國學術思想界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意識形態，漢代是最為關鍵的一環。

西漢制度演變的特徵，可從其禮制變革中窺見一斑。漢代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於是，禮學、儒生和漢家政權有過一次短暫的蜜運期：「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註 57〕顯示了立國之初制度建設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叔孫通的制禮觀念：「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註 58〕有人據此指出叔孫通是機會主義者，而非「醇儒」，殊不知，儒家的實用主義傾向和與時俱進的變革精神，才正是儒學與政治親和的前提。繼叔孫通從制度層面建立起儒士與漢帝國的關係之後，陸賈上《新語》，為高祖講論「行仁義，法先聖」的道理，進一步從思想層面確立了儒士在帝國形成之初作為社稷輔弼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後，年少才高、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賈誼於文帝執政時嶄露頭角，「賈生陳政事，大體以禮為根極」，〔註 59〕他指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註 60〕。於是「草具其儀」之外，還留下《新書》、《陳政事疏》、《過秦論》等文字，全面涉及禮制問題的各個方面，深入探討了禮作為立國之本、行政之據的特殊意義。這兩次禮制革新，結果並不樂觀：叔孫通之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面臨後繼乏人的尷尬；賈誼之議因「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落得個不了了之的收場。但漢初儒士留存下來的論說文關注治亂之道，彰顯致用精神，充分體現了其時儒士以興國安民為己任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註 57〕《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第 1030 頁。

〔註 58〕〔漢〕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叔孫通列傳》，中華書局，1959 年，第 2722 頁。

〔註 59〕〔清〕劉熙載《藝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0 頁。

〔註 60〕《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第 1030 頁。

從漢武帝到漢宣帝長達九十餘年的歷史，通常被稱作西漢中期。不同於漢初六十餘年以承繼古制爲主的制禮活動，西漢中期的禮制建設呈現出全面革新與發展的態勢，「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時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註61〕與之相應，武宣之世的文學創作也更加活躍：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註62〕

一方面，轟轟烈烈的禮制建設營造出的繁盛恢弘的大漢氣象，鼓動了文士建功立業的進取心；另一方面，大一統的帝國文化之下，文士個體獨立意識消泯，淪爲臣屬而不復爲君師，精神面貌發生了嬗變〔註63〕，文章以頌美爲主、勸百而諷一。經過抑黜百家獨尊儒術、制禮作樂完備制度、封禪改曆以立漢正朔服色等活動，加之丞相公孫弘、公羊學家董仲舒等人在制度和思想上的極力推動，武帝在位中後期，儒家禮義觀念逐漸取代道家黃老無爲思想而成爲執政者的主導思想。但《漢書·禮樂志》中「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的記載，多少反映了武帝制禮的名實之間還是有差距的。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的部分內容暴露了賢良、文學等儒士和御史、丞相、大夫等官僚在禮學思想上的分歧與矛盾。至於宣帝，在執政手法上雖不專執儒學一端，但對六經等儒家經典文獻給予了充分重視，並於甘露三年親臨石渠閣會議，其中的禮議，體現了儒士對於禮制建設的深切關注。這一

〔註61〕《漢書》卷六《武帝紀》，第212頁。

〔註62〕班固《兩都賦序》，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11頁。

〔註63〕查屏球在《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中指出漢武時代是封建社會士人文化品格的形成期：「與前期戰國時代相比，士人精神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士人由王師君友淪爲弄臣家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與自尊；由天下游士變爲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識；由布衣之士多變爲食祿之士，失去了獨立性；由四民之士變爲儒臣之士，失去了主體意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頁。）